

江万龄出版基金委员会

主 任 江赵兰润

委 员 李扬 王传纶 王国刚 王松奇

办公室 罗滢 赵一新 刘戈平

论文推荐小组

召集人 李扬

委 员（按姓氏笔画）：

王传纶 中国人民大学 范从来 南京大学

王国刚 中国社会科学院 陈百助 美国南加州大学

王松奇 中国社会科学院 陈志武 美国耶鲁大学

王广谦 中央财经大学 陈浪南 中山大学

王春峰 天津大学 陈雨露 中国人民大学

叶永刚 武汉大学 胡坚 北京大学

艾洪德 东北财经大学 贺力平 北京师范大学

朱新蓉 中南财经大学 郑振龙 厦门大学

刘锡良 西南财经大学 姜波克 复旦大学

李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 唐旭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

何佳 香港中文大学 谢平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

宋逢明 清华大学 戴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

江万龄博士基金会简介

江万龄博士 1937年出生于南京市，祖籍浙江杭州。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随后赴美留学，先后取得纽约大学系统科学硕士及凯斯理工学院战略学博士学位。

江博士是著名的美籍投资银行家，曾在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分校商学院执教多年，是美国经济学会、国际企业学会、电机和电子工程学会会员；1985年膺选为美国最具权威的企业研究机构 麦肯锡国际咨询及资深会员。江博士在台湾地区创业投资界居创始地位，有成功投资扶植新竹科技园区产业的实践经验。1986年，应当时台湾“中央银行”总裁及“经建会”主任委员俞国华先生之召，江博士返台出任“中华开发信托公司”（简称 悦网兑）总经理一职，为推动台湾地区工业发展和资本市场发展两方面作出重大贡献。主持经营十年后，江博士不但将 悦网兑从倒闭边缘拯救出来，1995年还被《欧洲货币》月刊评选为 1995年台湾地区最佳金融机构；并以总市值 100亿美元，在全球新兴市场中排名第 20位。

江博士是著名的爱国人士，对祖国统一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从 1988年起，江博士将其事业与精力转向中国大陆，并膺选为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顾问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顾问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清华大学管理学院客座教授。他穿梭于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著名高等学府，传授现代经济发展理论与企业管理经验，同时开始深入考察和研究中国大陆的国企改革、资本市场发展、风险投资体制与高科技企业培育等实际问题；并主持规模达 10亿美元的美西亚洲基础建设投资基金，从事对中国大陆及东南亚的直接投资。

1999年江博士在香港注册成立汉世纪开发金融公司，除成立台湾分公司外，已在上海、北京、深圳、西安及美国硅谷成立合资事业，专事中国高新科技工业及资本市场的开拓。

正当江博士在中国大陆的事业兴旺发展之时，他不幸于 2000年 缘月因

病逝世。根据他的遗愿，成立了“江万龄博士基金会”，以扶持、促进中国大陆在金融、资本市场、高科技产业化等领域的发展和建设为宗旨。并在基金中专门设立“江万龄金融博士论文出版基金”，旨在支持上述领域从事研究的青年才俊研究成果的出版。1999年又正式启动浙江大学江万龄金融研究中心，旨在为中国大陆培养与发掘优秀的金融人才。

总摇摇序

为了给中国从事金融理论研究的青年才俊提供一个展示才华的园地，我们拟从 1994 年开始，每年编辑出版一套“金融博士文库”。

这套文库将突出三个特点：

第一，入选文库的作者以新近毕业的博士为主。这些作者都系统地受过现代经济学的严格训练，对当前国内外最新的学术文献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对中国的国情有相当程度的把握。这些作者无疑多为“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我们出版他们的论著的本意之一，正是要不断地向理论界推出新人。

第二，入选的论文应能提供经过严密论证的新结论，或者提供有助于对所述论题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新材料和新思路。与当前社会上一些机构对学术成果的要求不同，我们并不特别提倡在一部著作中提出多少观点，一般，我们甚至也不追求观点之“新”。我们需要的是有翔实的资料支撑，经过严格论证，而且能够被证实或证伪的论点和理论体系。对于那些没有严格的前提设定，缺少合乎逻辑的推理过程，仅仅凭借少数不加说明的资料和数据，便一下子导出几个很强的结论的论著，我们概不收录。因为，在我们看来，提出一种观点和论证一种观点相比较，后者可能更为重要：观点未经论证，至多只是天才的猜测；经过论证的观点，才能成为科学。

第三，入选的论文应能熟练运用现代经济和金融理论的方法，在形式上符合学术论文的规范。我们在这里所强调的分析方法，就理论经济学而言，指的是在某一研究领域确定或建立基本事实以及这些事实之间关系的假设、模型、推论及其检验；就应用经济学而言，则指的是根据某一理论假设，为了完成一个既定目标，所使用的具体技术、工具或程序。我们深知，在方法上求新绝非易事，因此，我们对论文的基本要求，是按照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规范和基本逻辑来展开研究并构造论著。

出版这套论丛的最初动议，是由享誉国际金融界的华人投资银行家江万

龄博士提出的。江先生早年就读于美国著名学府。学成之后，他便投身于中国台湾省的“官营企业”和“党营企业”的整治工作，并作出了突出贡献。后来，作为领创业投资风气之先的投资银行家，他又为台湾省的创业投资体系的建设做了一些开创性工作。尤其可贵的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江先生满怀爱国之情，积极投身于祖国大陆的经济建设和金融发展大潮之中。他先在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国内数所著名高校中担任教职，孜孜不倦地传播现代金融知识；继而又利用其在国际金融界的威望，组织设立了若干只投资基金，致力于推动大陆创业投资体系的建议。不幸的是，正当他苦心经营的事业在祖国大陆粗见成效之际，他却离我们而去了。我们出版这套论丛并以他的名字命名，正是为了铭记他对祖国的金融人才培养和教育事业作出的贡献。

自 1980 年以来，本丛书共出版了 15 部博士论文，涉及金融领域的各个方面。丛书问世以后，受到金融学术界及业界的好评，其社会影响日益显现。作者毕业的学校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天津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国内著名院校。这些博士研究生毕业后，有的在国家机关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工作，有的在高校、科研单位从事教学及学术研究，也有的进入各种金融机构供职，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均作出了比较突出的贡献。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江万龄金融博士论文出版基金”资助下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博库”系列丛书，在相关方面的努力和支持下，必将推出更多更好的有造诣有独特见解的博士论文。

李摇扬

2007 年 1 月 1 日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1
第二节 张培刚教授对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反思	2
第三节 研究的目的是与方法	2
第四节 主要研究思路、体系框架和创新点	2
第二章 文化与现代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综述	3
第一节 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一般考察	3
第二节 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增长关系理论综述	3
第三节 现代经济增长与传统文化关系理论评述	3
第三章 区域文化与现代经济增长的关系	4
第一节 传统文化与文化精神	4
第二节 文化影响经济发展的案例分析	4
第三节 中国区域传统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	4
第四节 区域文化影响现代经济增长的路径分析	4
第四章 建立在创新型文化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新构想	5
第一节 工业化与创新理论的回顾	5
第二节 工业化定义：一个在企业家主导下 不断创新的过程	5
第三节 文化的成本收益选择：一个经济分析框架	5
第四节 建立在区域文化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新构想	5
第五节 区域文化精神对制度创新的影响：模型解释之一	5

摇第六节摇区域文化精神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模型解释之二	员圆
第五章摇中国吴越区域文化及其独特的创新精神	员远
摇第一节摇江浙模式：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奇迹	员远
摇第二节摇吴越文化的形成	员苑
摇第三节摇吴越文化形成的自然地理因素分析	员源
摇第四节摇吴越创新型文化形成的哲学思想基础	员怨
摇第五节摇吴越文化精神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兼容性	员猿
第六章摇吴越文化与“江浙工业化模式”的形成	员源
摇第一节摇江浙工业化道路的类型：民间发动的工业化	员源
摇第二节摇“江浙工业化模式”的形成机理：企业家主导下的 制度创新增长模式	员圆
摇第三节摇江浙工业化过程中的制度创新	员圆
摇第四节摇江浙工业化过程中的技术创新	圆远
第七章摇区域文化变革与区域经济发展	圆远
摇第一节摇区域文化变革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起点	圆远
摇第二节摇中国传统文化面临一次文化创新改革	圆猿
摇第三节摇区域文化变革与西部大开发	圆缘
参考文献	圆远

悦来悦去

Chapter 1	Introduction	转页
1.1	The Questions	转页
1.2	Prof Zhang Peigang's Reflection on Developing Economic Researches	转页
1.3	Purposes and Methodologies	转页
1.4	Main Research Methods, Theoretical Frame and New View points	转页
Chapter 2	A Brief Literature Re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转页
2.1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Economic Growth	转页
2.2	A General Int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odern Economic Growth	转页
2.3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 Economic Growth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转页
Chapter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 Culture and Modern Economic Growth	转页
3.1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ultural Spirit	转页
3.2	Case Study : Culture Influences dur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转页
3.3	Differences between Regional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转页
3.4	An analysis of the Regional Culture Influencing Modern Economic Growth	转页

Chapter 4	New Idea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Based on Creative Culture	韩蕊
4.1	Review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Creativity Theory	韩蕊
4.2	Definition of Industrialization: A Creative Process Managed by an Entrepreneur	韩蕊
4.3	Cultural Cost-Benefit Choice: Economic Analysis Framework	韩蕊
4.4	New Idea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Based on Creative Culture	韩蕊
4.5	The Influence of Regional Cultural Spirit on the Development of System	韩蕊
4.6	The Influence of Regional Cultural Spirit on the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韩蕊
Chapter 5	The Regional Culture and Particular Creative Spirit in Jiangsu and Zhejiang, China	韩蕊
5.1	Jiangsu and Zhejiang Model: A Wonder in China	韩蕊
5.2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su and Zhejiang	韩蕊
5.3	The Natural Elements for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su and Zhejiang	韩蕊
5.4	The Psychological Basis for the Culture in Jiangsu and Zhejiang	韩蕊
5.5	The Inner Consistency of the Cultural Spirit in Jiangsu and Zhejiang and Modern Market Economy	韩蕊
Chapter 6	The Industrialization Model of Jiangsu and Zhejiang & the Cultural Spirit	韩蕊
6.1	Type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Jiangsu and Zhejiang: Industrialization launched among the Public General	韩蕊
6.2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Jiangsu and Zhejiang: The Model of System Creativity Managed by Entrepreneurs	韩蕊
6.3	The System Creativity in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韩蕊

第6章 技术创新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	张园远
Chapter 7 区域文化改革与区域 经济发展	张园远
第7章 区域文化改革：发展中国家 经济增长的开端	张园远
第7章 中国传统文化：面对另一 文化改革与创新	张园远
第7章 区域文化改革与西部 中国经济发展	张园远
References	张园远

第一章 摇摇导摇摇论

第一节 摇摇问题的提出

1978年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从此步入了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可是，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时，在中国工业化总体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的同时，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也摆在了国人的面前：中国东、中、西部的区域经济差距拉大了。一方面，以东南沿海为中心的东部地区已经步入工业化的中期水平；另一方面，广大中西部地区虽然有进步，但工业化发展水平仍然相对落后，尤其是整个西部地区仍然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呈现日益扩大的趋势。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后，在全国范围内还出现了一种特别引人注目的经济现象，即东西部大经济区域之间的劳动力对流现象：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东部，形成所谓的“民工潮”，他们靠出卖苦力为生，赚的是小钱、辛苦钱；另一方面，以温州人为代表的东部人，不仅在当地办工厂，还深入中西部地区经商办厂、搞开发，赚回的是大钱。从劳动力流动的构成来看，中西部流向东部地区的除了体力劳动者即“麻雀东南飞”外，还有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素质人才，又形成“孔雀东南飞”的局面；而东部流向中西部的部分是到西部地区淘金的普通农民企业家。时至今日，西部的很多大学生因在本地找不到工作而处于失业状态，东南沿海的农民却很少有失业的情况。以上种种现象不由得令人深思：为什么同样处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东部地区能够迅速崛起，而中西部地区却举步维艰？为什么西部地区闲置的大学生不能够就地创业，成长为企业家，而东部地区的农民却能够在西部找到创业机会并转变为企业家？

从历史上看，中西部曾经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原地区曾创造了辉煌的农业文明，使中国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为什么进入近代工业社会后，黄河、长江流域却大大落后了？而中国的东部地区，历史上曾经的“南蛮之地”，却能很快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经过短短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才走完的路，大踏步地进入了工业化社会？这其中究竟是什么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造成中国东部和中西部经济差距扩大的深层次原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中国东西部的人们适应商品经济的能力竟然有如此的天壤之别？

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客观存在的，形成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十分复杂，而且多种多样。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解释，长期以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察：一是自然资源禀赋，包括耕地的多寡、非再生矿物资源的丰瘠等。地理环境因素是最早论述区域发展差异的系统理论。地理环境和自然因素的优劣确实可以对一些地区的发展差异做出较为有力的解释。但是，地理环境因素不能解释为什么在自然环境基本相同的地区却有着十分明显的经济发展差异，更不能解释为什么一些自然资源较为贫乏的国家和地区比那些自然资源较为富裕的国家和地区在一段时期有着更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二是资本因素，包括国民储蓄率、外部资本投资潜在引进规模等。资本因素仍是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经典解释，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原因是缺乏资本、储蓄率太低，因而形成发展经济学家纳克斯所谓的“贫困恶性循环”。不过，我们也不难发现，同样的资本投入率，在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经济增长率。资本使用效率低下，靠高资本投入带来的高经济增长终究难以持久。三是技术状况，包括教育水平、技术类型、研究和费用、专利申请数量等。我们可以发现，同样的技术条件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其使用效率是完全不一样的。四是交通因素。在现代市场经济这种大流通、大开放的经济环境下，交通闭塞无疑严重制约了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一些交通条件差不多的地区，发展的差异依然十分明显，有些路通了的地方，贫穷依旧。武汉市素以“九省通衢”而自豪，并且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有了“两通起飞”（交通、流通）的战略构想，但事实表明“两通”固然重要，但还不是起飞的最关键所在。

长期以来，研究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的学者，多半局限于从经济现象本身去寻找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原因，而对经济发展这一历史过程背后

的历史动因却很少进行深入探讨。而探讨经济从不发达向发达状态演进的深层次原始动力，是解释经济发展原因的关键，也是本书关注和试图研究的重点。

第二节 摇摇张培刚教授对发展经济学 摇摇摇摇研究的反思

摇摇发展经济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逐渐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主要研究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何通过经济增长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经济起飞，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主要障碍是资本、自然资源、技术等生产要素不足，只要输入大量的资本、技术设备，就能实现经济起飞；也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战略重点要放在提高储蓄水平和投资水平上，其中重要的是不断扩大物质资本的投资。但是，在当今经济一体化的世界里，当资本、技术、劳动力、信息等能在世界自由流动时，许多发展中国家拥有这些基本生产要素后，其工业化仍然没有实现。事实是：在纽约称得上最优秀的投资项目，在安卡拉和仰光却一败涂地；在底特律是最新式的设备，搬到开罗，可能是一堆废铁。人们还发现，一些资本积累率很高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实现经济起飞。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年过去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日趋扩大的趋势。

以上种种现象不由得令人深思：为什么在二战后同样的国际环境下，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会更上一层楼，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却举步维艰？为什么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如巴西、阿根廷等国家）没有发展起来，而没有资源的一些小国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反而腾飞了？为什么同样处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中国东部地区能够迅速崛起，而中西部地区却难见起色？为什么中西部地区闲置的大学生不能够就地创业，成长为企业家，而东部地区的农民却能够在西部找到新的经济发展空间？

所有这些问题，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里，都无法找到圆满的答案。

以经济发展理论为指导，尽管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经济增长相当迅速，特别是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但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道路上仍然没有多大的进展，尤其是发展中的大国，没有一个实

现完全工业化的愿望。从理论上讲，19世纪 50—70年代是发展经济学的兴盛时期，而到了 20世纪 80年代，由于发展经济学在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问题方面收效甚微，很多人对这门学科产生了怀疑。由此，发展经济学由高潮转入低潮，一些悲观论者甚至认为发展经济学已经在走向“死亡”了，因此，“发展经济学向何处去”目前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针对发展经济学目前所面临的困境以及西方某些学者对发展经济学前途的悲观论调，发展经济学创始人、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大师——张培刚教授在 1985年的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上，提出了建立适合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和要求的新型发展经济学的主张。对于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问题，张培刚教授已经为我们开拓性地指明了发展方向。在《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刍议》^①一文中，张培刚教授大气磅礴地指出了发展经济学新的发展方向，在国内外经济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了把发展经济学从目前的困境中拯救出来，张培刚教授倡导建立的新发展经济学包含了两个重要的观点。

第一，发展中大国应该成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张培刚教授认为，迄今为止，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仅仅局限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实行市场经济的中小国家。一方面，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方面，确实有不少成功的经验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研究和借鉴，但总的说来，毕竟其幅员较小，人口较少。而且像新加坡，只有城市而无农村；虽有制造业，但主要靠经营贸易，特别是转口贸易来发财致富和兴旺发达，其依赖世界市场的程度极高。因此，把它们作为世界典型性的代表是有局限性的。另一方面，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埃及等国，都是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国家，可是它们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上，却大都是步履蹒跚，难以稳定起飞和迅速发展。其原因何在？这是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学者所不能回避而且必须加以解答的问题。

发展中大国，无论以其人口幅员比重，还是以其政治经济影响，都在发展中国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大国迄今都未能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的羁绊。究其原因，一方面，在客观上，大国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比一般国家要复杂、困难得多；另一方面，在主观

^① 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刍议》，《经济研究》1985年第 2期。

上，自早期发展经济学问世以来，一直对大国问题的研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如果对这一类型的国家，仍然采取二三十年前那样的研究方法，单纯就经济论经济，势必难以找到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途径，难以找到“发展经济学”从所处困境中解脱的出路。因此，无论是单纯从解决发展中大国的经济问题出发，还是从发展经济学这门经济学科的长远发展考虑，人口和幅员在发展中国家（乃至在全世界）占有绝对比重的 发展中大国，完全应该成为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对象。如果这些 发展中大国不能很好地改变贫穷落后的状况，那么所谓的发展经济学就永远谈不上成功。换句话说，如果发展经济学不将其研究重点移向 发展中大国，那么就根本无法摆脱理论“贫困”或学科“危机”的困境。

第二，经济增长的源泉应该从区域历史、文化等内部因素去探寻。在《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刍议》一文中，针对发展经济学研究目前所处的困境，张培刚教授认为，我们必须另辟研究途径，采用全面的、历史的、从实际情况出发的综合分析方法，去探根溯源，研究现有的占世界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特别是那些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国家，阻碍经济发展的真实原因究竟在什么地方；然后对症下药，该补的补，使得阻碍发展的因素得以清除，启动发展的因素得以真正发挥作用。基于这种理由，张培刚教授认为，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首先必须从现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的历史方面来进行分析研究，探寻阻碍经济发展的最终根源。因为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大国，至今仍然迟迟未能实现经济稳定起飞和高速协调发展，未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其阻碍因素何在呢？这个问题大而复杂，这就必须首先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方面去探究根源。就中国来说，张培刚教授提出，历史上，究竟是什么因素阻碍了现代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发展？阻碍了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现代化在中国的发展？阻碍了民主和科学在中国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这个“历史幽灵”是否还在继续阻挠着今天的中国，使我们难以发展现代化的商品经济，走上社会化大生产和民主、科学的道路？因此，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应重点研究商品经济为何迟迟未能发展，工业化和现代化为何迟迟未能启动的深层次原因。张培刚教授还说：“社会经济历史方面的因素，对于今天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这种阻碍作用，不仅在中国可以找到，而且在其他发展中国家里同

样也可以找到，印度至今还背着宗教的和‘种姓制度’的包袱。它的这些历史包袱和因素，也和中国的情形一样，至今仍然阻碍着其经济的稳定起飞和协调高速发展。”

由此可见，张培刚教授主张建立的“新型发展经济学”下一步的研究方向应该是“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方面来考虑，探根溯源”，研究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的根源问题。

第三节 摇研究的目的与方法

一 摇研究目的

什么是影响现代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因素？长期以来，经济学者往往偏好从影响经济增长的外在要素中去寻求答案。从微观经济理论看，在给定的生产函数下，产出增长可以由投入的数量来解释；而从宏观经济理论看，主要是说明应该采取何种经济政策来保持产出增长和国民经济的平衡。而对于经济发展这一历史过程背后的文化精神动因，却很少有人进行深入的探讨，区域文化也从未成为经济发展研究的主题。然而，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地区从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演进的原始动力是什么，恰恰是最需要研究的关键问题。因为不先搞清楚经济演进过程中的内在动力和变革机制，就不可能推进经济的进步，因此，将区域文化纳入经济发展体系进行深入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从发展经济学的历史考察，许多经济学者很早就认识到，在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重大的文化与制度差异。尽管 20 世纪 50-70 年代一些经济学家曾经严肃地思考过文化差异是解释不发达的一项因素，但文化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被整合到经济分析中。那时的经济学家往往忽视了文化是经济发展的一项决定性因素，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化异质的认识挑战了传统经济学模型都存在的假定，即理性、完全信息与效用最大化。经济学家有时将其作为解释理性计算、自私与预见等现象存在的理由。经济现象的文化解释被视为对“经济人”这类公认观点的一种潜在的反驳。第二，文化变量不易测量。经济学传统并不考虑测量文化变量。第三，即使可以通过测量工具或是通过认识相似情境下不同行为模式的差异来发现文化的差异，人们也仍然很难找出相关的起因和结果。经济学家们建

构具有清晰定义的内外因素的模型，但他们却缺乏将文化变量整合进这类模型的工具。

将区域文化与工业化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研究区域经济增长动力和源泉问题，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涉及多方面的知识，包括宗教、哲学、文化、历史、社会心理以及经济学等多个学科，但这也是社会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社会学家格尔兹认为，人文社会科学近年来有三个基本趋势：一是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二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越来越远离通则的追求，而倾向于个案的深度诠释；三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也发展出成熟的“类比”，以解释所谓的社会事实。因此，将文化与经济发展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虽然是一项非常繁杂的系统研究工程，却是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相互融合、共同促进的大方向的，也是经济学研究发展到目前阶段的一种必然选择。因此，这是一片非常值得探索的学术天地。

鉴于此，作者大胆地涉入区域文化这个领域。本书将以中国改革开放后大放异彩的吴越文化作为分析模本，进而延伸到对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分析上，试图在一个多种民族、多元文化的发展中大国的背景下，探讨特定区域文化对企业家创新精神及企业家阶层形成的影响，进而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展开研究，力求通过对传统文化精神的解剖，解决现代区域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动力源泉问题。

通过探讨不同文化及其所包含的内在精神，来寻求经济发展的动力，并改造与现代经济发展不相符的价值观念，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将起到基础性作用。同时，作为世界上的文明古国，中国通过文化观念变革来推动经济发展的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将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

二 摇研究方法

进行经济研究，不仅需要明确的目的，还需要有科学的方法。全面考察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经济学的研究已经从生产要素理论转向更深的层次，即技术、制度以及发展观念等所谓的非经济因素日益受到经济学者的重视。在这样的前提下，要想将经济增长的源泉问题解释清楚，只有采用系统的分析方法，才能把握经济发展的实质和进程。因此，系统论的研究方法，是本书最重要的研究方法。

将传统文化与工业化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涉及多方面的知